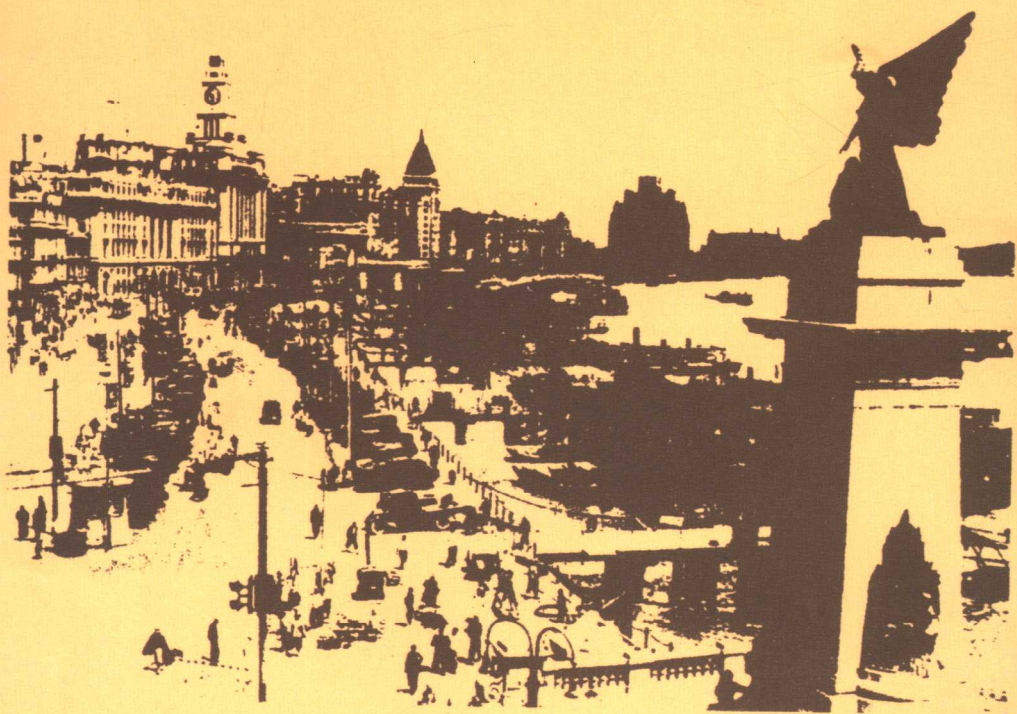


徐甦民 著

上海市民社会史论

shanghaishiminshehuishilun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民社会史论

徐甦民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市民社会史论/徐甦民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80741-130-7

I. 上... II. 徐... III. 市民-城市社会学-研究
—上海市 IV. 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4109 号

上海市民社会史论

作 者/ 徐甦民

责任编辑/ 甘 棠

封面装帧/ 靳 伟

出版发行/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1240 1/32

字 数/ 335 千字

印 张/ 11.625

印 数/ 1-4000

ISBN 978-7-80741-130-7

定 价/ 24.00 元



徐甦民

男 1953年生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多半时间
在农村务农
兼给那里的孩子上课
以后在恢复高考和“知青”回城的当口
先参加县城的高考
然后回到上海
结果是在上海读的大学
毕业后的工作履历
是机关、大学和报社
现为高级编辑

许久以来
一直是以零散的评论
表达对于文化和社会的关注
有两种电影专著
有两次剧作获奖

把对于历史的思考
形成著述
这是第一次
也是一个开始

序

一

1978年我回到上海进入大学时，满含着对于这座城市的游子重归的感怀。

然而接着，我就与它一同经历了新生的阵痛。

那时的上海，因为一次晨雾，就在浦江轮渡间造成了累累死伤；一次寒流，一夜间造成上海五万多处水管破裂。而当上海国际饭店楼顶亮起外商广告时，有人指责这是“殖民地的返照”；当浦东意欲引入外资银行时，一些上海人便重新提起“旧上海的故事”；当外滩某地块意欲租让时，有人便担忧“红旗将挂何处”。接着，人们又开展过对上海文化性格多有诟病的有关“上海人素质”、“海派丈夫”之类的讨论。

我于阵痛感怀之中又交织了深深的困惑：上海，你何至于如此？上海，你本来又该如何？

1992年以后，仿佛是忽然之间，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而这种情形所触发的，又是更大的困惑：上海，你崛起的能量究竟来自于何处？这一切的历史含义又在哪里？

也许没有一个城市，有着如此丰富的人格与思想的对应。我们生活在这里，熟悉它的风情和规则，但是我们又好像在历史与政治的

“车祸”中，失去了关于我们身世的那部分最关键的记忆；我们对祖辈业已铸就而我们必将继承的这座城市的灵魂，似乎有点陌生。

到了世纪之交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想要做一个有关“市民社会”的题目。

然而在题目清晰了以后，论述却并非一蹴而就，实际上它经历了一个断断续续的过程，而这样的停顿，却给予了本书的立论和论述以必要的重新审视和多次推敲的空间。

在这个过程中，我数次求教于赵昌平先生。他在选题上给了我鼓励之外，又在史实求证、立论方式和观念确立上，给了我详尽的意见和建议。这样的帮助诚令我深获教益。赵昌平先生学养深厚、立论持平和真诚赐教的学者与师长风范，更让我感佩铭记。

二

现实的困惑，将我引向对于上海历史的某种探寻。

近现代上海，曾经以它奇迹般的崛起，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上构成了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同时，它也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悬念——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历史玄机，使上海能够在百年之间，从一个三等县治遽然变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千百年来默默固守东海一隅的上海，它忽然之间的别开生面和日新月异，对于一个古老而正在衰落的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甚至在一切都已经成为历史的时候，某种所谓的上海精神是不是正在成为或者终究要成为一个现在时和将来时的概念？

当然，造就上海的历史原因是多元而互动的，比如上海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比如上海的开埠、租界所形成的独特的社会政治格局等等。然而一个虽属初级阶段却已具近代意义的市民社会，则应当是造就上海的主要的或者是根本的原因。

近代以后的市民概念，在人员组成和生活方式上，仍然保持着对传统的某些承传和延续；但是，它的历史意义，却是基本地取决于它特

定的时代内涵。“在中国,市民是一个相当古老的概念。它与乡民相对,一个老百姓,居乡则为乡民,住到城里,则为城市之民,也就是市民了。这与近代意义上的市民概念迥然不同。市民当然是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但近代意义上的市民是属于公共领域的概念,指的是城市自由民或公民。”(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5卷第3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变革中,上海的市民社会是一个独具内涵的部分。它的“近代意义”在于:上海市民及其市民社会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市场经济和多元政治的历史条件下,开始摆脱小农经济背景,摆脱对权力的依附,以及在社会体制和思想文化的近代变革中,逐渐形成了某种近现代意识和行为方式。对于社会的发展,以及对于个体权益、个人自由和社会民主,上海的市民社会虽然不曾具有很高的思想起点,但却开始形成了世俗的和切实的民间自觉和诉求。

市民社会是近代上海崛起的内在原因,也是它崛起的结果。对于近现代的中国,它也应该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

但是在动荡曲折的近现代时局中,上海的市民社会仅仅只维持了一个短暂的历史停留。而在这样的历史呈现中,它自由和民主的价值理念,使得它在晚清以降的政治格局中,始终遭遇到遏制和冷遇。在创巨痛深而又激昂蹈厉的近代中国,上海市民温和与理性的变革主张,又遭遇到激进主义和强权意志的排斥。此外,近代以后反对专制体制的政治潮流,总是使抽象的“人民”概念更具“正当性”,而市民群众的世俗化的价值诉求,却始终遭受到了主流文化的某种鄙视和漠视。

因此,曾经创造了某种历史景观和契机的上海市民社会,却始终没有历史的文本中,获得它应有的认知和地位。

然而,当历史的原有面目终将不断地、顽强地展现出来的时候,这也许就意味着,我们将在对历史的重新寻访中,获得对于上海乃至是对它的市民社会的某种新的认知。

徐姓民

2006年10月28日于上海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上海的天时、地利、人和	(1)
一、天时——上海开埠	(1)
1. “不为遥制”的“国中之国”	(6)
(1) “治外法权”	(6)
(2) “不为遥制”	(12)
2. 主权形式与国民身份	(16)
3. 上海租界的规模效应	(20)
二、地利——“立场”决定视野	(22)
1. 上海,“襟江”而“带海”	(24)
2. 比邻江浙,左右逢源	(27)
3. 上海的“看海”	(29)
三、人和——从移民到市民	(33)
1. 共同的移民履历	(35)
(1) 战争难民	(35)
(2) 流民无产者	(36)
(3) 各种学人和知识分子	(37)

(4) 各地绅商	(40)
2. 共同的市民身份	(41)
(1) 城市资产者	(42)
(2) 产业工人	(44)
(3) “中间阶层”	(46)
(4) 小商小贩和个体劳动者	(48)
(5) 外籍“居留民”	(49)
第二章 求真务实,融会中西	(52)
一、物用器具的西化现象	(53)
1. 标新立异上海滩	(54)
2. “原来外国的苍蝇那么大”	(56)
3. 价值评判的实践标准	(60)
4. “师夷人之长技”	(65)
二、西学“政”、“教”及其兼容	(69)
1. 开风气之先的移风易俗	(69)
2. 民主的镜鉴与启蒙	(72)
三、国民意识与国家认同	(76)
1. 洋人之恶	(77)
2. 上海的抗争	(83)
(1) 爱国集会	(84)
(2) 罢工、罢市、罢学	(86)
(3) 抵制洋货	(88)
四、开眼看世界	(91)
1. 所谓沪人“亲美”	(92)
2. “黄金十年”中的上海	(97)



3. 上海的“和为贵”	(102)
(1) 历史的传承	(103)
(2) 要竞争不要战争	(107)
五、近代上海的心结:国力	(109)
1. 国力衰败,国难未已	(110)
(1) “祸福恃人终难久也”	(110)
(2) “中国弱,日本是贼”	(112)
(3) 国弱则子民蒙难	(115)
2. “商战”立国	(119)
 第三章 个体本位及其历史的定义	(127)
一、个体概念的历史异同	(129)
1. 同质个体的“马铃薯”	(130)
2. 应运而生的异质个体	(136)
(1) 社会分工改变个体属性	(138)
(2) 契约化的社会关系	(139)
(3) 道德评判与历史评判	(141)
二、“哪里没有私产权,哪里就没有正义”	(148)
1. 私产权的历史形态	(149)
(1) 权力之法器	(149)
(2) 权钱交易的历史版本	(153)
2. 私产权之上海新天地	(156)
(1) “上海地方等级已乱”	(158)
(2) 从权力资本到资本权力	(164)
三、近代人权的女权标志	(170)
四、上海的“义”“利”之辩	(178)

1. “人须先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179)
2. “君神合一”之历史批判 (181)
3. “有教堂的市场经济” (188)

第四章 由市民而社会 (191)

一、法律的公约机制 (192)

1. 没有秩序就没有自由 (193)
2. 公信与聚合 (196)
 - (1) 以体制建构公信 (196)
 - (2) “不通人情”的人情 (201)
3. 法律的“群众性” (204)
 - (1) “沪人健讼” (204)
 - (2) 从“讼棍”到“律师” (206)

二、“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 (208)

1. 赤子之痛 (209)
2. “我爱咱们的国呀!可谁爱我呀?!” (215)
3. 对国家的自主认同 (220)
4. “国家主义”的窠臼 (224)

三、个体本位与社会伦理 (229)

1. “纳税人”意识 (229)
 - (1) “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 (230)
 - (2) “为市政目的而自行纳税” (232)
2. 市民社团的作用和意义 (236)
 - (1) “团结就是力量” (237)
 - (2) 民间团体的异生物——黑社会 (240)
3. 慈善事业的社会功能 (243)

第五章 市民社会的体制诉求	(247)
一、反对“己亥建储”	(248)
二、君主立宪运动	(252)
1. 体制变革的上海舆论	(252)
2. “中国国会”和“预备立宪公会”	(255)
3. 和平立宪还是体制革命	(259)
(1) 规避流血的市民性格	(260)
(2) “广义革命”论	(264)
(3) 一个历史的契机	(266)
(4) 忧虑之一：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270)
(5) 忧虑之二：文化的毁弃	(274)
4. “天意难回，人事宜尽”	(280)
三、走向共和	(284)
1. 市民参与的辛亥革命	(286)
2. 政治妥协下的共和体制	(289)
3. “共和”的哀痛	(293)
四、一些反思	(297)
1. 思想理论准备不足	(297)
2. 对市民社会的认识盲点	(298)
3. 民主随“集体强权”而走样	(300)
4. 民主随政权争夺而异化	(301)
第六章 独立的报纸舆论	(303)
一、报纸的先天属性	(303)
1. 报纸原是“新闻纸”	(303)
2. 民主启蒙的工具	(309)

(1) “恪守报馆为发表舆论之天职”	(309)
(2) “解读民主”之先声	(311)
二、公共舆论的载体	(314)
1. 秉持公众立场	(316)
2. 现代“乡校”及其公议形式	(318)
三、公共价值的公约平台	(328)
1. 推崇物质文明	(329)
2. 推崇观念更新	(332)
3. 主动为民代言	(336)
四、“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	(338)
1. 体制外运作	(338)
2. 与时俱进 适时革新	(342)
3. 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	(345)
结语：在重启与再造中	(350)
一、市场经济：否定之否定“再否定”	(351)
1. 政府主导与市民认同	(351)
2. 市场主导与市民意愿	(353)
3. 同步增长的精神需求	(355)
二、若为自由故	(356)

第一章 上海的天时、地利、人和

人类共同生活的需求，造就了村郭和城邦的渐次兴起。人类社会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城市的发展史。这种社会共同体的结构模式，又造就了政治形态的产生和发展，诸如国家、政府、宗教、社团等等，无不是附着于城市之上并且推动着城市的发展的。

作为一种历史的现象，城市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要求。这同时也就决定了居住、流通、生产、生活方式等多种物质性条件与城市发展所构成的必然关系。

正是遵循着历史的脉络，又在天时、地利、人和的“灵机一动”的天作之合中，上海铸就了自身的近代崛起。上海市民社会的历史意义，当然会超越城市的范畴，但是它的形成，却首先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

一、天时——上海开埠

在通常的叙述和认识中，上海正式立县建城是在1292年的元代“至元二十九年”。但是许多人更愿意把上海的历史追溯到更远，比如追溯到北宋初年的“青龙镇”。那种希望本土故城凭藉年代的久远而获得某种历史荣耀的愿望，是一种常情与惯例。但是上海的荣耀，其实并不在于它历史的年轮及其文化的久远积淀；甚至恰恰相反，上

海的价值和意义,主要是近代以来,它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所具有的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那么为什么上海这个遽然成型的世界都市,其城市化的进程在它千数百年的漫长岁月里,却几乎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和拓展呢?

这首先是因为,上海由它近海渔、运的自然经济,逐步繁荣兴盛以至逐渐成“市”的过程,原本只是整个内陆经济和农业文明的附属部分。“起初这地方是连城墙都没有的,直到明朝年间,为了倭寇常来骚扰打劫,方筑起一座城墙。此后,它是靠着本地的努力。渐渐的兴盛起来,的确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绩,在英国人占领的时候,也不过是一个三等县治罢了。”^①“据 19 世纪 40 年代两次抵沪的英国植物家福钧的估计,当时上海人口约为 27 万;而杭州为 100 万,苏州、南京、宁波为 50 万;长江三角洲地带的松江、嘉定、常熟、嘉兴、无锡等拥有与上海相似的人口。清代上海的地位远不如苏州,《松江府志》等均有‘府城视上海为轻,视姑苏为重’的记载”^②

因此,只要内陆经济和农业文明的历史规定性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上海也就只能在它原有的轨迹中,慢慢地滋长与发展,而无法在近代历史中形成自主的潮流。

那么,当源自西方世界的海洋经济的浪潮,不断拍击太平洋的东岸,不断激发着上海换代转型的时候,为什么上海仍然迟迟未能迈入资本主义的近代城市化的进程之中呢?

这又是因为,这种城市的发展要求所必须凭藉的“天时”条件——政治体制的变革与革新,当时还没有在中国发生。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学说,任何经济形态的历史变革,都必然地要与既定的社会政治体制紧密关联。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就是由它的工业革命和它的社会政治变革,配套形成的。也因此,开启上海近现代城市化进程的历史契机,首先就在于它的“天时”条件。

① [美]霍塞:《出卖上海滩》第 4 页,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

② 杨东平:《城市季风》第 40、41 页,东方出版社 1994 年版。

而传统封建的政治体制和保守的国家政策,就使上海在命运的冥冥昭示中,长期处于进退失据的局面。

上海临江濒海的地理形势,决定了它的发展与海洋经济紧密联系的格局。早在宋、元时期,上海的海上贸易即已形成了规模。进入明代,上海的海运与通商更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是洪武年间的“海禁”,却令这一切顿然遭至扼阻;而海禁则是事出朱元璋在削平群雄时的对手,曾到日本谋求结盟。但是海禁的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许多海商为生计所迫,终于铤而走险,从事非法海运,甚至转商而为海盗。当时的情形正是“寇与商同是人也,市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明嘉靖年间,也就是在黄浦江开浚一百年以后,来自东海上的真、假“倭寇”频繁侵扰中国沿海,烧杀抢掠,威胁海运贸易,其间五次进入长江侵袭上海。原先“承平晏然”的上海海面不再风平浪静。在这种形势下,由于当时的守土自安的基本国策,明朝政府没有沿着郑和的西洋之行而制定制服倭寇、平定海域、拓通远海商路的方略,相反却很快实施了进一步的“锁海”政策。到明世宗的时候,朝廷甚至颁布法令,“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对于“素以通番为生”的海商,施行严厉的禁锢措施,而敢于“私造双桅大船下海者,务必一切捕获治之。”于是,上海筑墙围守,它初步兴盛起来的海上航运,由此遭到了极大的封阻。

清代顺治年间,以“反清复明”为号召的郑成功据守台湾,成为清朝政权的心头大患。为防止郑成功的进攻和渗透,清政府颁发了峻厉程度甚于明代嘉靖“锁海”的“海禁令”。它限令沿海居民内迁三十里居住;此外,“片板不准入海”。上海经由海洋经济而使城市转型换代的可能机遇,再一次被国家决策所阻断。

直到康熙年间,上海护海塘前仍竖有“居民过限者,梟首”的禁牌。康熙在亲自巡察及权衡了海盗与海靖的关系以后,解除了“海禁令”。虽然其准许的海运贸易仍然是限制重重,查验极严,然而即便是如此有限的开放,却仍然对上海的经济发展和人员流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上海从此开始步入中国沿海重要贸易港口的历程。

但是好景不长,到了乾隆年间,因为以“天朝大国”的心态面对日益频繁的中外交流,保守封闭的思想又成为统治集团的主导意识。于是清政府再次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海上的对外贸易只限于广州一处,其他各港口的航运只准对内,不准对外。这样的国家法令甚至迫使上海完全退守到了内陆经济的格局,上海终于只能望洋而徒然兴叹。

因此,在海洋经济已经发出强烈召唤的时候,因为封建体制及其政策的阻碍,使上海的经济形态和城市格局仍然长期处于墨守成规和因循守旧的状态。据《中国封建社会晚清城市研究》一书记载,在1843年按人口排名的中国城市中,上海被排在10名以外。当时的上海县城因为初显繁荣,因而被人称之为“小苏州”。

然而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上海终于以一个近代都市的规模和属性,在古老中国的东海之滨平地崛起,并且在此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远东的第一大都市。毫无疑问,其中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在于上海的社会政治格局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不是由本土的经济发展及生产关系的变革所最终导致,而是来自于外部力量的侵入与触发。无庸讳言的是,正是近代上海的开埠和租界建立,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变局,造就了近代上海崛起与发展的历史契机。

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以后,上海被迫开埠。上海之成为大英帝国指定的对外通商口岸,缘起于十年之前一艘英国舰船“阿美士德勋爵号”对于上海的一次“偶然”的造访。其实,当年的那次造访是以西方近代的资本主义经济扩张为目的的一次考察。虽然那次偷偷摸摸的考察违反了大清条例,但它却是第一次从世界性的地缘经济的角度,预见了上海在“世界经济”中的巨大潜能以及可能扮演的非凡角色。

于是《南京条约》以后,上海很快就被迫登上了世界的舞台。然而这个历史契机的确是极具特殊性的。在当时,尽管《南京条约》以及嗣后的《虎门条约》都是清朝政府战败的直接结果,但是当时的中